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 成果要报 》

2018 年第 23 期 （ 总第 145 期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 编

2018 年 05 月 23 日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超越

佟家栋

【内容简介】在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上，习总书记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它为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实施勾画了蓝图。其中充满了新时代的深刻思想内涵。我们理解，“一带一路”倡议是经济全球化理念下的新地缘政治经济思想，它超越了传统的地缘政治经济学。

一、前人的研究成果

地缘政治即地理政治学（geopolitics，根据《辞海》第6版的定义），是关于国际政治现象制约于各种地理要素和人文要素共同作用结果的理论¹。地缘经济是在地缘政治的影响和支配下，国家与区域之间围绕商品市场、资源供应、资金技术流向等形成的竞争、合作与结盟关系。

德国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 Ratzel, 1844-1904）是地缘政治理论的奠基人。其理论核心是用达尔文的优胜劣汰的生物竞争理论来解释社会关系和社会现象。1901年他在《国家空间增长的规律》一文中，将一个民族看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认为一个寻求领土扩张的国家，就好像是一个正在生长的生物有机体寻找生长空间一样。拉采尔罗列了国家扩张的7个规律，其中两个是：国家的空间随着文化的发展而增长；国家的成长通过合并及吞并小国来实现（杰弗里·帕克，1992；丁力，2010）。因而地缘成为一个国家存在和生长的关键载体。

这种地缘政治的理念，也伴随西方对海洋控制权的追求，将理论的研究，延伸到对海洋的控制上。海权论的代表人物美国海军战略家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A. T. Mahan, 1840-1914）则强调控制海洋对国家和战争的重要性。1890年，马汉在其代表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中指出，制海权是国家繁荣昌盛的重要标志和基本；谁能控制海洋，谁就能成为世界强国；而控制海洋的关键，是对世界主要海峡和海上通道的控制（Mahan, 1890；杰弗里·帕克，1992；丁力，2010）。学者们将一国，特别是强国追求自身强大的立脚点，不仅局限在陆地上，更多地聚焦到海上的控制权，或“霸权”上。

陆权论（即“大陆腹地论”）代表人物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特·麦金德（H. Mackinder, 1861-1947）认为，区位和自然环境是决定世界权力结构的重要因素（R. J. 约翰斯顿，2004）。1904年他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基于陆上霸权的中心思想，将世界划分为枢纽地区（即“心脏地带”）、内新月形地区、新月形地区。其中，位于欧亚大陆中部和北部的俄

1、夏征农等，2009，p.444。

国、东欧及中亚地区被称为“心脏地带”。

我们认为，地缘政治经济学强调以地理空间为平台，通过对特定区域的控制，追求政治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现或保持一国（或国家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以海路权和陆权（心脏地带）的统治或控制为关键点。欧洲学者哈尔福特·麦金德（H. Mackinder, 1861-1947）的观点是，东欧是陆路的核心地带，谁统治了东欧、中亚，谁就统治了世界，因此东欧在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太平洋地区，东南亚作为重要物资运输的通道是海权的必争之地。

从历史的考察中，我们也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陆权方面，前苏联占据绝对优势，在海权方面，美国具有压倒性优势。冷战结束后，欧洲通过经济一体化，力图通过经济手段，实现政治上的一个欧洲（Single Europe）。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海上的唯一超级大国。

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先后倡议，提出了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更引起相关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应该说，该战略倡议的形成是有特殊的历史背景的。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应对美国为首的国家在亚太地区，建立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积极回应。金融危机后，美国在金融危机，乃至经济衰退中受到沉重打击，经济恢复乏力，处于长期低速增长中，另一方面，它希望在国际经济秩序重建中，掌握主动权，引领21世纪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和国际规则的重制。美国主导下，2015年10月5日，12个亚太国家草签了建立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的协议，等待各国国会通过后执行。在该协议中，提出了更加严格和高规格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准入标准，并将中国排除在外。在美国与欧洲的合作中，美国提出，建立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同样具有排斥中国的目的。客观上要求中国加以应对。

其次，中国经济在经历了抗衡和抵消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

不利影响后，也进入了“三期叠加”的调整期，产能的过剩，产品的库存和产业升级的压力同时摆在中国经济面前。为此，需要借助多方力量，特别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走出去、引进来”加以具体推动。客观上，要求中国寻找新的需求，推动中国不仅着眼内部调整，也需要外部寻找出口。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引起了人们对中国“智慧”的关注。以美国为首的12国草签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2016年11月9日，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上任伊始，首先签署文件，退出TPP，尽管其它11个国家仍然希望，经过多方共同努力达成的协议继续维持，但是美国的退出，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企图停滞下来。加之人们担心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利己主义态度，人们普遍担心，经济全球化能否可持续，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的环境能否保持？

总之，无论国内国外，无论是理想或现实，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都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带一路”倡议显得更加重要，同样，人们也更期望，一带一路“不是一个权宜之计，而是一种长期的战略倡议。

三、“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内涵

习总书记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意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一方面，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从陆路方向实现经济带国家之间的贸易、投资联系，实现各国之间的相互经济合作。保持和发展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全球化态势，避免贸易保护主义，避免逆全球化在沿线国家的出现。

从沿线国家的需求看，一些中亚、东欧国家在实现了政治独立之后，多数国家选择了市场经济，加入了欧洲联盟，取得了经济的发展。然而有两大因素，迫使它们寻求新的发展支持。一是，这些国家所加入的欧洲联盟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机制，欧盟给这些新成员国以广阔的内部市场，但是，这些国家发现，在他们尚未建立起工业化，缺少发展的基础设施之前，它们难以享受这些市场。二是，欧盟在金融危机中，同样受到较大冲

击，因而金融危机后十年，其经济始终处于脆弱的恢复期。它们对“一带一路”倡议中所提出的一系列合作共赢的主张充满期待。

中国对“一带一路”合作的需要是，良好的国际经济贸易环境，替代被排斥的TPP成员可能减少的贸易市场，进而实现产能的转移。

这种潜在的经济合作机遇被“一带一路”倡议焕发出来。

但是，从西方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看，我们力图大力开展合作的地区也是地缘政治理论指出的“心脏地带”。中国提出的“16+1模式”旨在与包括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保加利亚共和国、波黑、波兰、黑山、捷克共和国、克罗地亚共和国、拉脱维亚共和国、立陶宛共和国、罗马尼亚、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维尼亚共和国、匈牙利等16个国家。应该看到，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对中国而言同样具有战略意义。我们通过合作，帮助这些国家、地区建立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通过直接投资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或工业区，换取我们缺少的自然资源和能源。在中国看来，这种合作是必然的，既然要从地理上将陆路连接成为一个经济带，必然要抓住该经济带的关键环节，而东欧、中亚则是一带一路在地缘方面的关键环节或地区。

从海上丝绸之路看，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建立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口岸和地区。据专家们统计，中国的主要海航线有36条，其中经过马六甲海峡的有21条航线，占中国主要海路航线的2/3左右。因而，要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地区显得非常重要。这一点也与传统地缘政治理论所强调的“海权”的关键港口和航线理论观点相印证。

然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强调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强调国家之间的政策沟通，以便推动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自由、投资便利和金融自由化，因而更强调地缘经济。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19世纪末以来，在地缘政治理论指导下，解决政治问题的最高形式是战争，而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人类社会深刻地认识到，靠战争取得对

世界的控制权必然是两败俱伤。因此，各个大国，特别选择经济的方式，实现对特定目标市场的控制，以期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二是，欧盟在过去65年的时间里做出了很好的榜样。1951年法国、西德（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1958年建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成员国经济一体化水平不断升级的同时，在成员国的数量上也不断扩大，从6个，增加到9个、10个、12个、15个、25个、28个。尽管英国在谈判“脱欧”，仍然没有改变欧盟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欧盟的政治家们始终认为，建立“统一欧洲”（single Europe）才是欧洲一体化的根本追求。从本质上，欧盟依据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即通过地缘上的经济控制手段，实现统一欧洲的政治目标。欧盟的成功给世界经济中的一体化进程提供了和平的模式。

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现代地缘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不是以地缘连接为手段，以经济政治控制为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参加一带一路的各个国家一律平等，从本国利益出发，共商合作模式，共建合作机制。因此，能够看到，“一带一路”倡议的贯彻执行是以务实的态度，从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需要出发，实行多种形式，多个模式的经济、贸易、投资合作，乃至金融信贷合作；其次，“一带一路”合作强调不建立合作的统一机制或机制性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给各参加合作的成员以较大的自由度。地缘只是各国经济合作的基本线索或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超越了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学以控制者获取最大限度利益为目的的生存法则，强调所有参加国“共享”一带一路所创造的经济环境给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因此，“共商、共建、共享”成为“一带一路”战倡议的核心思想，即是强调以经济全球化为目标的新地缘政治经济。它强调，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创造一个陆地和海洋，乃至全球的贸易自由、投资便利、金融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环境。而这种环境的建设要以“共商、共建”的原则开启，形成各国商量着办的国际经济治理

模式。以“共享”作为一带一路实现的目标。

中国扮演的角色首先是一个桥梁。据专家统计，在所有的6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有80%的国家比中国经济相对落后，20%左右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中国先进。因此，中国所扮演的是带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完成工业化的任务，同时与发达国家或先进国家合作，实现中国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工业现代化的任务。

中国在“一带一路”战略倡议中客观存在着自身利益的追求。这种追求是，中国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中国过去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证明，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一个全球化的国际贸易、投资和自由化的经济环境是中国延续其发展态势的关键。相反，逆全球化，以邻为壑，搞贸易保护、投资保护、乃至金融保护都不符合中国的发展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本身所要营造的经济全球化环境包含着中国的根本利益。其次，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不希望国际经济的新秩序，新的治理模式是一个排他性的，遏制中国经济继续发展的规则，而是要“共商、共建”，有助于所有国家经济的发展。第三，中国强调，当今世界的金融危机，经济衰退都不是一个国家受到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已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商、共建，避免经济负面冲击，营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共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福利是引导各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利益所在。因此，中国期望，一个既符合中国利益，更符合世界各国长远利益和经济发展利益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学的新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四、结论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一带一路”理论是中国在全球化调整期或转型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是超越传统地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全球化地缘政治经济理论，强调全球治理；

中国的“一带一路”理论是超越大国主导、强调各国一律平等，共商、共建、共享的理论设计。最大的特点是超越一国，或国家集团控制的假设；

中国的“一带一路”理论是，试图超越传统大国势力范围，实现各民族和谐、共荣的“利益共同体”理论；

“一带一路”理论是，带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各国经济增长，实现世界经济重振的大胆探索。

【作者简介】

佟家栋，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南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南开大学允公集团董事长、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欧盟研究会常务理事、欧洲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应用经济学科学学位分委员会主任。